

国际问题研究报告

2019 年第 21 期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变迁表明，海洋话语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我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对海洋话语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海洋话语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基本界定，以探究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明确中国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

一、海洋话语的概念以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海洋话语的概念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进行界定，狭义的是指涉及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文化的叙事呈现与影响，广义的是指涉及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商业以及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文化呈现与影响。海洋话语转变是指涉及上述涉海因素的影响，内涵以及叙述主体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把海洋话语进一步细分，可分为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商业等海洋硬话语，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文化等海洋软话语。

海洋硬话语可通过具体数据加以说明，更加偏向物质，是有形话语，更具强制性，是影响力话语。海洋软话语可通过具体文字加以表述，更加偏向理念，是无形话语，更具引导性，是吸引力话语。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海洋硬话语在海洋霸权争夺的起始阶段更为重要，是一国海洋权力和优势的重要依托，为一国海洋权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加以强化和提升，以强制性影响力得到他国的承认与服从，进而建构本国所主导的话语格局和国际秩序。海洋软话语在海洋霸权格局的稳定阶段更为需要，是一国海洋影响和优势的重要凭借，为一国海洋威望奠定充足的意愿氛围，通过具体的政策文件来加以框定和完善，以引导性吸引力得到他国的认可与跟随，进而维系本国所主导的话语格局和国际秩序。

我们结合国际关系的演进，就会发现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虽然并非完全同步，但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海洋话语的发展特别是海洋硬话语是以一国的国家实力特别是硬实力为基础和前提的，海洋硬话语的增强可提升其强制性影响力，进而建立他国承认和服从的海洋霸权，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其国家发展意愿和原则，建构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国海洋话语的衰落则是一国国家实力下降的体现，特别是一国维护海洋秩序稳定的意愿下降和实践活动的减少，是其国内发展问题多发或发展动力不足的集中体现。随着全球海洋事务的发展，各国意图通过原则、规范、规则和制度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来拓展本国的海洋优势、追求制度性权力，各国之间的海洋诉求差异明显和海洋合作需求上升在并行发展。随着全球事

务的多维变迁，海洋软话语的建构力度和竞争强度在逐步提升，构建海洋软话语的空间和格局在进一步拓展。

二、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互动阶段

目前来看依据国际关系实践，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转变互动可分为两个阶段，既欧洲主导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时期，美国主导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时期。划分依据是，该阶段的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主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即由哪些国家或区域占据国际海洋话语和国际秩序的权势。

第一阶段是欧洲海洋话语与欧洲主导国际秩序阶段。

由地理大发现开始，近代第一次出现了欧洲海洋军事、海洋科技、海洋商业等海洋硬话语，与欧洲海洋理论、欧洲海洋文化等海洋软话语。欧洲的霸权是以其海上力量的技术优势、完善的火炮、社会组织以及整个的经济优势为基础的。欧洲海洋硬话语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传统欧洲海洋强国的交替崛起为代表。葡萄牙、西班牙的海洋霸权属于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荷兰的海洋霸权属于商业资本扩张，英国的海洋霸权则属于工业资本扩张。一国拥有强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海权和海洋话语，便可以拥有建构国际秩序的优先权和主动权，海洋话语是国际秩序转变的助推力和风向标。欧洲海洋软话语以荷兰对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英国重商主义为代表。西方国家追求海洋霸权的根本出发点其实是为了争夺海洋中的无限资源和利益，西方海洋文化是一种集

贸易、掠夺和殖民为一体的侵略性文化，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开始，到英国均是如此。欧洲海洋话语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两者并非完全同步，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关联。

第二阶段是美国海洋话语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阶段。

从 20 世纪初延续到今天，出现了美国海军、海洋商业、海洋科技等海洋硬话语与美国海洋理论等软话语。作为美国海洋硬话语比较集中的体现，1922 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海军强国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确立五国海军比例为 5.25:5.25:3.15:1.75:1.75，美国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地位，美国海洋硬话语被国际社会所承认。随后历经一战、二战以及冷战，美国海洋硬话语持续稳定的增长，至今无人匹敌。美国海洋软话语主要以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的提出，到 20 世纪中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到了 21 世纪初“空海一体战”等为代表。可见美国海洋话语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之间尽管并非同步，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

三、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的新阶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不可逆转。海洋话语作为国际秩序转变的风向标，是否也在经历新的态势变迁呢？是否出现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互动的第三个阶段？我们需对此有一个系统客观的分析。

（一）海洋话语主体多极化趋势凸显。

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明显下降，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明显走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拓展海洋话语的意愿和积极性不断提升，对于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改善的诉求和努力也会增强。国际事务主体间呈现出“多中心”甚至是“去中心”趋势，延续许久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海洋话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背景下，无限制的拓展本国海洋话语权势、不考虑他国正当话语诉求和格局需求愈发显得不切实际、不可实行。

（二）海洋话语议题多样化趋势凸显。

军事因素在海洋话语中的分量在下降，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比重在逐渐提升，高新技术、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手段在海洋领域的作用在加强，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价值凸显。海洋话语争夺已经逐渐延伸至深海，深海大规模探索及开发日益进入各海洋大国的发展与科技议程。外交折冲和法理斗争正成为获取权力、利益和话语权的主要形式以及国际海洋政治的主要内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BBNJ）国际协定”谈判，以及“国际海底资源开发规章”制定等重要国际海洋立法稳步推进。海洋制度性话语权在不断强化，各国在海洋治理领域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方面的重视度和参与度不断加强，规则竞争的态势会持续增强。

（三）中国海洋话语产出与实践逐步增强。

目前海洋军事、海洋科技、海洋商业构成的海洋硬话语正在呈现

出一种有利于中国的转化趋势。比如说中国的海洋商业开始遍布全球，航母和舰艇的数量在持续增长，海洋的科技投入与产出目前也可圈可点。2018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684万人，海洋经济总值83415亿元，比上年增长6.7%，占国内生产总值9.3%。我们的海洋软话语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例如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与实践，“蓝色伙伴关系”的全球性建构等等。但是构建丰富的海洋软话语，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任重而道远。

（四）国际海洋新秩序阻力颇多，前景美好。

美国主导的海洋话语和国际秩序业已延续至今，美国并没有通过有效的、常规的利益动态调整机制来协调秩序内部存在的矛盾或纠纷，在面对新的利益诉求时存在反应的滞后性和调整的惰性，这不利于秩序内部关系的协调、矛盾的缓和以及安全的建构，会导致国际海洋秩序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如何协调新兴国家海洋话语诉求和传统国家之间的关系平衡，如何更好的处理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全球海洋善治是符合各方最大利益需求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中国智慧与责任担当，是一种超越国家海洋利益的关切；指明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海上国际关系是发展趋向，推动全球海洋合作事务的广泛开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发展前景的，国际共建是必然趋势，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将是各方的共同追求。

（撰写：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国际问题研究报告

主编：张蕴岭 副主编：张景全 执行副主编：徐海娜

主办：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学院

联系人：刘孟娇 电话：15854651231

报送：中央、山东省政府有关部门，山东大学学校领导、主要部门、学院领导

交换：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机构